

我對於中國革命的回憶

陳鵬仁譯

一
一八九七年，抵達橫濱的孫中山先生，不久便跟滔天到九州熊本縣的荒尾村來。由於荒尾村是個有名海邊的一座小村落，所以我跟嫂嫂（滔天之兄民藏夫人）非常操心應該如何款待這位遠來的賓客。我們給孫先生燒洗澡水，鋪地毯於客廳給他坐；至於吃，那時更不知道中國菜的做法，因此祇有請他吃鄉下的日本菜。

生魚、味噌湯、煮魚、壽司、鰻魚等等，我們想盡了辦法款待他。我們更幾乎每天殺雞給他吃。孫先生似乎最喜歡鰻魚和雞肉。而縱令我們請他吃他不大喜歡的東西，他也滿面笑容而邊說「好、好」(all right-all right)邊吃。他吃了沒吃慣的生魚，結果似瀉了肚子。日後第一次革命(亦即辛亥革命——譯者)成功，他就任臨時大總統，我前往爲他祝賀時，孫先生之說「荒尾的生魚很好吃」，也許是他回想當年勞神焦思的肺腑之言。

而身在荒尾村的孫先生的頭，滿清政府曾經給它懸獎一萬元。我會將此事告訴同村的平川老先生，他却眨眨眼睛說：「呀！一萬塊錢。真是了不得！」其他的村人也來，並從籬笆偷看這位稀客。

孫先生是位寡言的人，而且一天到晚祇要有空則手不釋卷，所以在我們家的一星期左右，一直在看我們家裡的書。而要跟滔天到福岡方面去設法軍事費用時，則說「這裡的書我都很喜歡」，並把行李箱裝得滿滿地帶去。

回到橫濱以後的孫先生，則搬到東京去，而跟犬養毅先生等共同策劃革命的實行。滔天開始東奔西走，因而一點也不顧我們的生活。有一次我跟滔天商量家庭的經濟，而他竟說：「我有可用於革命的錢，但沒有可以養活妻、子的鈔票，妳應該自己想辦法」，完全不理，因此我和孩子們的生活遂陷於絕境。所以我不得不開始工作，於是遂進行擬從海邊地下挖出貝殼燒成石灰來販賣的計劃。在荒尾一帶，有許多人在幹這一行

。在娘家原爲「千金」的我，來到宮崎家以後，則不得不從事這樣的工作。而大概由於間接地聽到我們生活的困苦，孫先生曾經暗中時或給我們寄錢來。

二

一九〇〇年，孫先生在廣東立了革命的計劃，因此決定從日本偷渡廣東。孫先生先走一步，而在當時玄洋社（譯註一）俱樂部青柳先生處，則擬參加這次革命的末永節、平山周和島田經一等等，以及直接間接幫忙革命的大養、福本日南等先生在那裡商討此項計劃。

那時，由於沒做慣的工作，我在荒尾害了胸部的病，因此把龍介和農作交給家父，而帶着幼女節子在福岡醫院養病。

關於連天的協商和計劃的內容，我是不清楚的，不過有一天，滔天曾經把這些人和我帶到福岡郊外名島的島田經一先生家裡。島田先生家是座沿着海岸之山的很好的房子，猶如仙境。這時

我親自聽到跟滔天喝酒的島田先生說：「這座很舒適的房子亦不得不賣了，賣來打仗」。四、五天後，滔天將我留在福岡，而跟其他同志由門司往廣東出發。而賣出去的島田家產，則用於惠州起義的一部份軍費。

惟孫先生的第二次起義又歸於失敗，所以孫先生和日本的同志們也就重新回到日本來了。

而幫助中國革命運動之家庭的悲慘，實在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這不祇是我們的辛酸，也是其他同志的家庭所共同遭遇到的命運。

這的確是有如邊流着血淚而坐在滿車火焰的車子上的情景，我們既將大部份的田地賣光，並將其金錢統統用於滔天的活動費。而在這苦況中，聽到孫先生計劃的失敗，我們當然失望萬分。這時我接到從中國大陸回來的滔天患了腳氣症，因此遂到東京去看他，是時孫先生正住在橫濱市山下町的小屋子裡。

見了小康的滔天之後，我和滔天跟那時正在華僑學校（大同學校）教書的民藏一起去看孫先生。旋即孫先生以敗軍之將的神態並用不知什麼時候學會的日語說「歡迎你們來」。

當天晚上，我們三個人在孫先生家過夜。而正當我們坐上桌椅準備吃晚餐的時候，透過滔天的翻譯，孫先生問我說：「妳是來做什麼的？」我答說：「因為滔天生病，以及家族生活困苦，我把小孩托在娘家，因此想趁這個機會跟滔天好好地商量商量」，於是孫先生邊說「是的，是的」，並從皮包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

這是一張孫先生的母親、胞兄、四位侄子和

十二、三歲左右的孫科先生一起合照的像片。孫先生邊讓我這張照片，邊說：

「我的家人在夏威夷也正流着眼淚在跟窮苦搏鬥中。家人之能夠打勝眼淚意味着革命之將為成功。凡是從事於革命運動的人，都得戰勝眼淚」。

並流着淚珠。而這也是我和滔天看到孫先生眼上有淚的第一次。

在山下町孫先生家過一夜的我們，第二天便到民藏在大同學校。我們三個人則在民藏的客廳談話。一坐下，民藏便向我並用純粹的肥後口音（亦即宮崎鄉下土話——譯者）大張眼睛並回想昨天晚上的事，邊稱讚那位中國革命婦人，邊鼓勵我說：

「在照顧孫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國婦女同志，真是個女傑。她那用長筷子，張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飯的樣子，革命家的女性祇有這樣纔能擔當大事。」

妳看她聲音之大。妳應該向她看齊纔對」。而正當我跟滔天再三商量故里的事情，並大致商量完了的時候，滔天突然向民藏和我說：

「到現在為止，我都還沒向任何人說過，不過我現在却決心要做說浪花節的（譯註二）。這是因為，做為一個浪人（譯註三），實在很不容易不依靠別人而能養活家眷。既不能生活，而又不會做生意；而就是做生意，以士族（譯註四）的生意經，也絕對賺不到錢。何況談浪花節以得之於客人的好意亦並不下賤，這有若出家者讀經以得布施同樣的道理。惠州起義雖失敗，但革命

的進行刻不容緩。並且，唱浪花節還可以澄清心神的憂愁。我想暫時以做了和尚的心情去叩浪花節師之門。哥哥請您能瞭解，也請妳能同意。」

滔天以很大的決心，並很熱心地向民藏和我訴說。因此民藏和我大嚇一跳。頓時，我的心頭充滿了失望和黑暗。我為我丈夫將棄經世之大望且或將墮落到底而大為震驚。所以我拼命努力去勸阻他的念頭。我甚至建議他跟孫先生一起到歐美去研究和宣傳革命。我以為用這樣的方法去糾合同志，籌措軍費乃是此時斯地所應該遵循的惟一途徑。與此同時我請問了民藏的意見，而他也贊成我的說法，並跟我諄諄告誡滔天，要他回心轉意。

可是，滔天却完全不聽我倆的勸告。他說「籌措軍費，糾合同志，還是以唱浪花節的方法來做最為有效」；是即他似乎想以唱浪花節的方法來籌募金錢和糾合日本各地的同志。民藏和我終於精疲力盡，再無法勸阻他了。於是滔天和我遂與民藏分手而回到東京。

爾後，孫先生前往東南亞，而滔天則拜師桃中軒雲右衛門，遊歷日本各地。但是，滔天欲做講浪花節者時所期待的糾合同志，宣傳主義，籌措資金等事則統統成為畫餅，因此家庭生活的困苦與日俱增。

三

一九〇五年元月，由於極端的貧窮，我母子四人終於再也無法棲身故里，於是遂遷居東京，而租屋於新宿區番家町。

而惠州起義失敗以後，孫先生則離開日本，革命氣氛爲之很消沉，祇是有內面的運動而已。（譯註五）不過自我們搬到番家町以後，簡直令人不敢相信地，中國留學生源源而來。因此我彷彿覺得革命運動已有相當的進展。那時候常到我家的，有革命元老的黃興、胡漢民、汪精衛、張繼、宋教仁和何天炯諸位先生。此外還有很多，幾乎每天來的，現在我已經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了。

其中有些研究製造手鎗者，他們則穿着滿身油的工作服，到東京郊外滔天的朋友小室友次郎所經營的手鎗工廠去學，這一群真是個個都是富於實行力的人。

不特此，連領取清朝官費的留學生也一個一個地變成革命黨員；而在日本人中，像末永節先生，則跟黃興先生住在一起，以策種種活動。

四

記得在一九〇五年初夏，孫先生再度來到日本，並下榻橫濱。有時候他則從橫濱帶着皮箱到我們並不寬闊的家，而把其中狹小的六個榻榻米的房間當做他在東京的「事務所」。當時，我們雖窮，我却把我的衣服拿到當舖去，而爲孫先生做了兩件「浴衣」。（譯註六）孫先生很喜歡穿我給他做的浴衣，而一九一〇年又來日本時，他更還穿着它，因而使我驚喜萬分。孫先生是位非常節省和樸素的人，而他之一直穿着那兩件浴衣就是它的明證。

祇要有時間，孫先生便從皮箱拿出許多書本來閱讀，所以他的行李盡是書刊。就中最多的是

英文書，而這些大多似乎是政治、經濟、哲學方面的書籍。當時，滔天的鄉友，姓勝木的夫婦恰巧也住在我們家裡。有一天，孫先生正在走廊看書的時候，勝木先生走近孫先生想跟孫先生聊天，可是孫先生却祇連聲答說「哼哼」，而一直在看他的書，以這樣的態度聽勝木先生的話。

於是勝木先生大爲憤慨，並以肥後的口腔說：「這是什麼話！說孫文孫文是個豪傑，這樣待人簡慢怎麼……」

因而非常生氣。而這却也是孫先生之如何愛看書的一個插曲。

有一天，從外面回來的孫先生，因爲累而正在睡午覺，這時剛好來了四、五個年青的中國留學生。

他們恐怕打擾孫先生的睡眠，所以在隔壁房間用很小的聲音說話，隨即一個比較年輕的站起來輕輕地把「竹紙」（譯註七）開一點點，以偷看孫先生睡覺的樣子。而那個學生却把眼睛張得大大地回來坐下去，並好像受驚的語氣用中國話向其他的人在說什麼。我覺得奇怪，所以遂問最會說日本話的一位說：

「怎麼啦？」

「孫先生好像獅子。他的臉和頭髮簡直像是隻獅。革命一定能成功。」

他加重語氣這樣答說。因此我也去看看，果然睡得很甜的孫先生的臉，的確擁有不可侵犯的威嚴。

中國留學生對於孫先生非常尊敬，所以那時

候我就一直相信中國革命必有成功的一天。

五

當時，最喜歡調皮的龍介和震作，常常一從學校下課回家便到窗戶店（譯註八）去買些隔扇（譯註九）的碎木頭，來造成鐵路，架設於庭園，並用線板的車輪和小箱子製成火車，使其在鐵路上跑，他倆就這樣玩到天黑。

有一天，停止看書的孫先生正在看孩子們玩火車的時候，何天炯先生剛剛趕到。他看見孫先生在熟視孩子們玩，因而遂問孫先生說：

「您在看什麼？」

孫先生答說：

「這真好玩。他們把鐵路造得很好」。

同時透過何先生的翻譯而跟龍介和震作握手並說：

「革命成功以後，中國首先需要建設鐵路，那個時候我就請你們兩個人來做」。

婦女的我，當然不可能知道每件革命大事，不過從同志們的動靜，我却可以判斷革命運動之如何急速地正在進展。

六

在孫先生還沒有來到日本以前，留日中國同學的中心人物是黃興先生，而自孫先生從歐洲來到日本以後，他們兩位便攜手，因而完成了革命黨的大團結。而促使孫先生和黃先生合作的，就是滔天和末永節先生。大同團結而成的革命黨叫做中國革命同盟會，且一下子就有大約三千人

參加為會員。同盟會成立後，則在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創設民報社，以發行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而其幹部則統統在報館共起居同飲食。

與同盟會成立的同時，孫先生則從橫濱搬到租在牛込區築地八幡傍邊的房子，並把它命名為「高野寓」。爾後許許多多的人曾經出入於高野寓，其中最值得我們一提的賓客，就是俄國革命黨領袖格爾雪尼和比利斯茲基兩位先生。

比利斯茲基先生是從西伯利亞的監獄逃出，並逃到長崎來的。而正在此時，格爾雪尼先生於一九〇四年受了死刑的判決，並被送至西伯利亞。

格爾雪尼是俄國革命時社會革命派的元老，而據說，他是使用奇計逃出監獄亡命日本的。比利斯茲基先生有天晚上陪同格爾雪尼先生訪問了高野寓。

那個時候，滔天與萱野長知、和田三郎等諸位先生在出「革命評論」（譯註一〇），是時比利斯茲基先生帶格爾雪尼先生拜訪了革命評論社。於是滔天和萱野先生便把這兩位先生帶到孫先生那裡去。而在高野寓聚首的東西方的先知先覺者，遂就俄國和中國的革命發表高論，交換意見。爾後格爾雪尼離開日本前往歐洲，擬再回到俄國時在路上因病而與世長辭。

當時，「民報」的銷路非常好，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之間當然不必講，據說在大陸也有很多的人在看。而要把這些「民報」寄到大陸去確是談何容易，因此民報社的同人個個都日以繼夜地在工作。而隨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日趨壯大，清朝官吏的監視日嚴，日本官方的壓迫亦日甚，其結

果，孫先生不得不棄築土的高野寓，民報社亦難於維持，從而終於不得不「關門大吉」。

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的前後，似乎需用不少錢，而為孫先生慷慨解其囊者就是鈴木久兵衛先生。而民報社解散後，黃興先生則在小石川區水道町創辦學舍，與同志們共策革命。

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以後，我們又得從番家町搬家。這是因為欠人家房租、米店和酒店的钱太多所致。對於米店和酒店，我們各寫了一張將來有錢時一定要清還的保證書，至於房租，請允許我們免交，這樣我們纔勉強強能夠搬出去。

其次我們在小石川區的第六天町找到新房子。這座房子相當大，所以來的人也就比較多。

禪寺和尚龜井一郎先生、早稻田大學學生長江清介氏、黃興先生的大公子黃一歐、龍介和震作等年青的朋友們經常在院子裏練習劍術，還有許多中國留學生也常常來參加，因此我們家裡非常熱鬧。而汪精衛夫人陳璧君女士之攜帶她的朋友來練習劍術，也正是在這個時候。

自民報社解散以後，中國革命運動便採取地下活動的方式，革命黨人的秘密來往因而增加，並且需要更多的武器。有時候甚至要把武器運到四川省一帶，其用心之苦，實在難以筆墨形容。更有用胃散藥罐裝上火藥帶回中國者。

而何天炯先生的計劃購買日本政府擬轉讓給民間的武器，惟沒有錢，因此遂把我娘家的古董統統賣掉以爲其費用也正在此時。由於秘密活動之如火如荼，日本政府當局的干涉也就愈來愈兇。有一次，東京神樂坂警察所所長忽然竟說要請

滔天在日本餐館吃飯。滔天雖然去了，可是却非常慨嘆警察所長之愚笨的作法。

而聽到這樁事的孫先生，遂給滔天寫了如左的書信。

「滔天先生足下：久未通問，夢想爲勞。比接克強兄來書，述足下近況，窮困非常，然而警吏欲賄足下，足下反迎頭痛擊之。克兄謂足下爲血性男子，困窮不濫，廉節可風，要弟作書慰謝。弟素知此種行爲，固是足下天性，無足爲異。然足下爲他人國事，堅貞自操，艱苦備嘗如此，吾人自問，慚愧不如。弟以此事宣之同志，人人皆爲感激奮勵，則此足下天性流露之微，已有造於吾人多矣。（後略）弟孫文謹啓。」

七

一九〇八年，時機大概相當成熟，黃興先生遂帶三百支手鎗和某某先生所贈送的七十把日本刀到廣西去籌劃起義。同時，日本方面的同志也設法獲得了一千支步鎗，慢黃先生一步動身。他們是準備在廣東跟攻下廣西後將來廣東的黃先生會師的。當時裝載那些步鎗的船叫做幸運丸，是承三上豐夷先生的好意借用的。而幫忙設法這些步鎗的就是被人譽爲革命黨之天野屋利兵衛的倉地鈴吉先生。又，跟這些武器乘船到香港的有金子克己、萱野長知、前田九二四郎、三原千尋、定平吾一和吉田正平等諸位先生。

這一群，可以說是革命黨的敢死隊，他們都是以死不生還的決心出發的。並且在航海中，兩隻鷹飛到船裡，他們把鷹抓到，以爲此行或將成

功，惟天機似尚未成熟，很可惜地，這次計劃又歸於失敗了。

本來，據說幸運丸所載的武器是預定在大亞灣附近起貨的，而且跟黃興先生方面的人早已連絡好，惟打來的電報祇說六時，不知道是上午六時或下午六時，所以船裡的同志們遂爲此事而終於分成了兩派。前田、定平兩位先生說是下午六時；萱野、金子兩位先生以爲是上午六時。彼此議論很久，結果假定它是上午六時，並把船停下來，以等天明。但在天還沒亮以前，英國軍艦來了，於是他們遂把所有的武器統統丟到海裡去。計劃之失敗，往往來自毫厘之差。而後來據說，那封電報的意思是下午六時。

這個時候，孫先生正在南洋專心從事於糾合同志和籌募革命資金。因此在日本的活動一切皆由黃興先生來負責。不久，孫先生雖然接到革命軍佔領了廣東一帶的電報，但似又失敗了，所以孫先生又不得不再亡命歐洲。

八

在這前後，我們的生活又日趨窮困，革命運動也沒什麼進展。有一天，滔天和黃興先生忽然到九州去設法銀根。而當他們在九州的期間，我跟房東談妥，於是我們便再從第六天町搬到小石川區的原町。搬家時，所有行李都是由小兒龍介、震作和黃一歐三人拉車子搬過去的。搬到原町以後不久，滔天和黃興先生便回到東京來。而黃先生則在新大久保租了很小的房子跟宋教仁先生一起住。他們的名牌用「桃原宅」三個字，而這

似乎取自武陵桃源。

黃先生在新大久保時，發生了所謂「紙幣事件」。這是黃先生想爲中國革命使用而印的。爲了此事，黃先生曾經向橫濱的高利貸借了一萬塊錢，並托某日本人來印，結果不但紙幣沒有印成，錢又不還，把黃先生弄得毫無辦法，而終於逃到香港去。不過這一萬塊錢，第一次革命後，黃先生却把它還清了。

這一年（一九〇八年——譯者）十二月，滔天的母親在故里去世，滔天遂回鄉奔喪。而爲了生活，我邊鼓勵兒子們用功，邊借了縫衣機來爲海軍做軍服。此時突然由香港的黃興先生來了重要而機密的書信，我跟侄子宜雄商量結果，便給滔天打了「槌子病危速回來」的電報。接到我的電報的滔天，大概給山科多久馬先生（他是一直爲革命黨人義診的一位仁醫）打了電報，所以山科先生馬上就來看我。山科先生看我非常健康而大驚一跳，我把底細告訴他，他終於哈哈大笑。

在這裡，我必須說說倉地鈴吉先生的事。因爲他是中國革命秘密運動的且大家都不知道的一大功勞者。是即中國革命所用的武器彈藥幾乎都是由他來的。當革命黨人與滔天商量武器彈藥的事時，滔天實在是束手無策的，絞盡腦汁思索的結果，終於跟以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的司令立花小一郎上將商量。立花上將是滔天的哥哥民藏的太太的哥哥。立花上將以「身爲官員，難以爲力，願意介紹可靠的朋友」，於是爲滔天介紹了以遠征千島列島馳名的海軍上尉郡司成忠民。當時郡司氏已經退役，而他介紹給滔天的就是倉地

先生。如此這般，孫先生、郡司、倉地兩位先生以及滔天四個人再三互相研究的結果，倉地先生終於成爲了中國革命的所謂天野屋利兵衛。（往年大阪的義商——譯者）

九

自從我們從第六天町搬到小石川區的原町大約一年以後，孫先生跟乃兄孫德彰先生忽然從夏威夷來到日本。記得這是在一九一〇年初夏的事情。此時，孫德彰先生在夏威夷的事業已失敗，故與孫先生一起來日本，並住在我家裡。這時孫先生特地爲我帶來了佔領廣東時所發行的銀幣兩張和軍票。孫先生脫下因汗而略濕的立領的西服而換上的竟是五、六年前我千方百計設法給他做的現在已經變成很舊的浴衣。

一生貧困是中國革命家之常，孫先生既窮，我們也窮，因此爲了要給遠來的賓客洗塵，想燒洗澡水，我們竟連煤炭和劈柴也沒有。不得已，用小兒們從隔壁的空房子檢來的木片燒熱水給孫先和他的哥哥洗澡。

一〇

有一天黃昏，一個中國人來看孫先生。他的名字叫做孫竹丹，也是同志。惟由於種種理由，許多人說他有間諜的嫌疑，並非常警戒他。因此孫竹丹一進門，我便耳語孫先生，並要龍介陪他而從後門出去。那時正值每七十六年會出現一次的所謂哈勒大彗星（Halley's comet）出現的時候，而孫先生和龍介兩人則在小石川區附近後街

盡量避免行人，逍遙到晚上十一點多鐘纔回來。爾後不久，則有孫竹丹被同志所殺的傳說。

孫先生來原町的我們家的前後，從小石川區富坂署常來一位名叫北村利吉的高等刑事警察。這位警察看到我們那麼窮，終於每次來我家時都帶茶葉來給我們。因為我們連客人來時也沒有茶葉可泡。

孫先生跟孫德彰先生在我家住了大約十天，在這期間有些瑣話可述。其中最使我難忘的是，不知道爲了什麼事，孫德彰先生在大罵孫先生。孫先生被乃兄責罵，一言不發，一直默默地在恭聽乃兄的話。個性很强的孫先生，也有這一面，這個事實使我們非常地感動。

孫竹丹到我家兩三天以後，富坂署的警察部長前田佐門和前述的刑警北村，送來了勒令孫先生出境的命令。此時孫先生跟滔天等剛剛開始秘密計劃，因此接到這種命令後非常失望。二、三天後，孫先生和乃兄便往南洋動身。這時我們全家把孫先生昆仲送到新橋車站。離開日本的孫德彰先生，據說不久便病逝。

一

一九一〇年四月，汪精衛先生和黃復生先生到北京去準備暗殺醇親王。而其所攜帶的炸彈就是從倉地先生那裡來的。汪先生的計劃因事先被發覺而沒成功，汪、黃兩位先生且被捕，並被判死刑，惟被肅親王所救，改爲無期徒刑，而關在北京的監獄。汪夫人陳璧君女士，趕赴北京，爲救汪黃兩位先生的生命而做最大的努力。

迨至第一次革命成功，南京的革命政府和北京的袁世凱開始南北和平會議時，汪、黃兩位先生始獲釋，汪先生並與唐紹儀先生任特使由南京到北京。

一九一一年四月，以黃興先生爲首的一群在廣東起事，這是在檳榔孫先生的居所，由以前的中國革命同盟會的同志們所策劃的。而這次起事所使用的武器，也都是得自前述的倉地先生。是即倉地先生秘密地所集來的武器，皆托輪船的革命黨人充當的火夫帶去的。惟很不容易捆包，所以這項工作，大部份在我的弟弟前田行藏家偷偷地做。而從倉地先生家到行藏家的搬運，則由當時尙爲中學生的龍介和震作分批搬去。因爲用小孩來搬運，比較不會引起人家的注意。

這樣捆包好的行李，則由四川省出身的吳永珊（玉章）先生運到以前的新橋車站，現在的汐留車站，再由此車站而運到橫濱的輪船。惟在新橋車站，因比諸其容積，它的重量太重，因此對其貨物本身發生懷疑，而不予以馬上輸送。着急的吳永珊先生立刻到橫濱清國領事館，請他的朋友出一張證明說是領事館的東西，而趕回新橋車站，以求得車站站員的愿解，纔把它寄出。

當時，吳永珊先生是東京帝國大學（今日的東京大學——譯者）的學生，而在當日，中國革命運動非常澎湃，官費留學生更不必說，在清國領事館和公使館的下級官員之間甚至有許多革命黨員，由此我們當可知道中國革命時機之如何成熟的一斑。

此次廣東的一役，雖然大家都用真子彈拼命

戰鬥，但結果仍歸失敗，黃興先生負了喪失右手兩支手指的傷，許多同志戰死沙場。而今日在廣州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就是此一戰的犧牲者。

及至今年秋季，在四川省發生了變亂，隨之有武昌的起義，中國革命運動頓時由其最低潮而見其成功。而當這個革命的烽火燃燒起來時，孫先生正在法國。滔天很想早點去，惟家裡窮得不能再窮，因此不能馬上成行。其他比較有辦法可想者，如萱野長知、加納清藏、松浦和介、金子克己、龜井一郎和三原千尋諸位先生則較滔天早一步往武昌出發。

由於適時趕到的石丸鶴吉和島田經一兩位先生的幫忙，滔天終能起程。尤其可貴的是，不嫌我們的貧窮，而始終跟我們來往的東京某染衣店老板川城七太郎先生由衷送錢禮說：

「先生！我的眼睛沒有錯吧。這祇是一點點意思，少得或無足於您的旅費，請您在船裡買些香烟抽抽」。

滔天則與川城先生乾杯並哈哈大笑說：

「二十五年的苦難今日纔見天日。被人家貽笑爲夢想和空想的革命終於成功了。不過今天以後纔是真正的開始」。

匆匆整理好其便裝的滔天，遂幌着那高大的身軀，悠悠然地走上他的旅途。滔天直往上海，爲迎接孫先生從法國回來，然後再轉船到香港。而返抵上海的孫先生，則與同志們聯袂入南京，並就任臨時大總統，於茲中國的革命乃大功告成。（譯註一一）

（附註）

(譯註一) 玄洋社，係明治時代的日本國家主義團體。一八八一年，由平岡浩太郎、頭山滿、箱田六輔等所創立，平岡任社長。它的份子活躍於中國大陸和韓國；它是所謂大陸浪人的母體。

(譯註二) 浪花節又稱浪曲。由一個人唱講故事。在今日日本還是非常流行。他們常常藉浪花節來批評政治，諷刺社會。

(譯註三) 這裡所謂浪人，係大陸浪人之簡稱。它有時候寫成「牢人」或「空人」。原意是沒有固定主人、工作和住所的人的意思。這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江戶幕府創立初期，因為德川採取取消德川幕府尚未成立之前反德川勢力的諸侯的政策，竟致使無主可奉的浪人激增至四十萬人。

(譯註四) 士族，係明治維新以後，對於以前武士階級的稱呼。

(譯註五) 原文說「內面運動」，這可能是秘密運動的意思。

(譯註六) 「浴衣」，念成 Yukata 是日本人洗澡後要穿的長衣服。由於穿脫方便，而且穿起來很舒適，所以就是不洗澡，平常在家也在穿。男人穿得比較多。

(譯註七) 「竹紙」，其原文是「唐紙」，在這裡它是用竹紙造成而用以隔房間的門的意思。

(譯註八) 窗戶店，其原文為「建具屋」，是專門製造日式房屋的門、隔扇等的店。

(譯註九) 障子，讀成 shoji，是用以隔開日式房屋之房間的紙門。

(譯註一〇) 原文把「革命評論」當做每部四頁的報紙，但實際上它是每期十頁的半月刊。它創刊於一九〇六年九月五日，一共出了十期。

(譯註一一) 本文譯自日本平凡社出版宮崎滔天著「三十三年之夢」附錄宮崎龍介作「關於家父滔天的種種」裡頭滔天夫人宮崎槌子口述的部份。這篇文章原係於一九三一年六月，國民政府將國父的遺靈從北平郊外的碧雲寺移到南京郊外紫金山麓中山陵的時候，特別邀請滔天夫人到南京參加此一大典，而在動身前所口述，並以「我對於中國革命的回憶」為題在東京「每夕新聞」連載的。

永記紙業有限公司

專 銷

模 造 紙 印 書 紙
中 西 紙 張 批 發 零 售
價 格 公 道 隨 叫 隨 送

地 址：臺北市大理街二十巷四號
電 話：三三〇三二二三

最新機器
承印書籍

彩色印刷
證券商標

新文化彩色印書館

館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八八號
電話：三三九七五七號